

柳鸣九的菜园子风光

王蒙

柳鸣九的大名早已贯耳。他是法国文学专家、翻译家，是研究法国包括欧洲文化思想的学者，他的视野宽阔。我对他的学术成就有一知半解，更有相当高的敬意。记得在一个场合与他同处，一些学友纷纷被披上了教授、博导的光环，而对他的介绍是他的多少位学生担当了教授与博导。而今有幸蒙他厚爱，读到他的《种自我的园子》（四川文艺出版社即将出版）清样，他的文学，他的思想，他的语言，笔力深沉与宅心仁厚，仍然给了阅读者以新的冲击，以佩服与享受，以快乐与叹息，以感动与心花的放而不怒。

单单一看名单，他所写的人，就够你焚香敬奉一番的了。马寅初、梁宗岱、冯至、朱光潜、李健吾、钱锺书、闻家骅、卞之琳、何西来、吕同六，还有西蒙娜·德·波伏娃等等，都是我辈闻大名、未能近观的当代大家。除了鸣九，谁还能这样切近与体贴、捉摸与把握、善意与理解地，以快乐与叹息，以感动与心花的放而不怒，问切着他们灵魂的甘苦潮汐。谢

鸣九，为我们留下了一组大师的背影，一个时代的高端知识分子的群体风貌。

鸣九不是靠写大人物为自己拔份儿，他不咋呼，不张扬，也没有摆出宣示判词的架势，更没有所谓作家散文的酸溜溜与扭捏态。他多年来与这些学者共事，从大背景入手，从小细节下笔，写出了他所尊敬的长辈与同事在大时代小环境中的人性表现，记了时代，记了人生，记了外表，记了心曲，记了极其平常却是鲜为人知的故事。他的观察细微而敏锐，他的笔力游刃有余，有直抒，有曲致，有简评，有感悟。点到深处，恰在关节，读来你实在放不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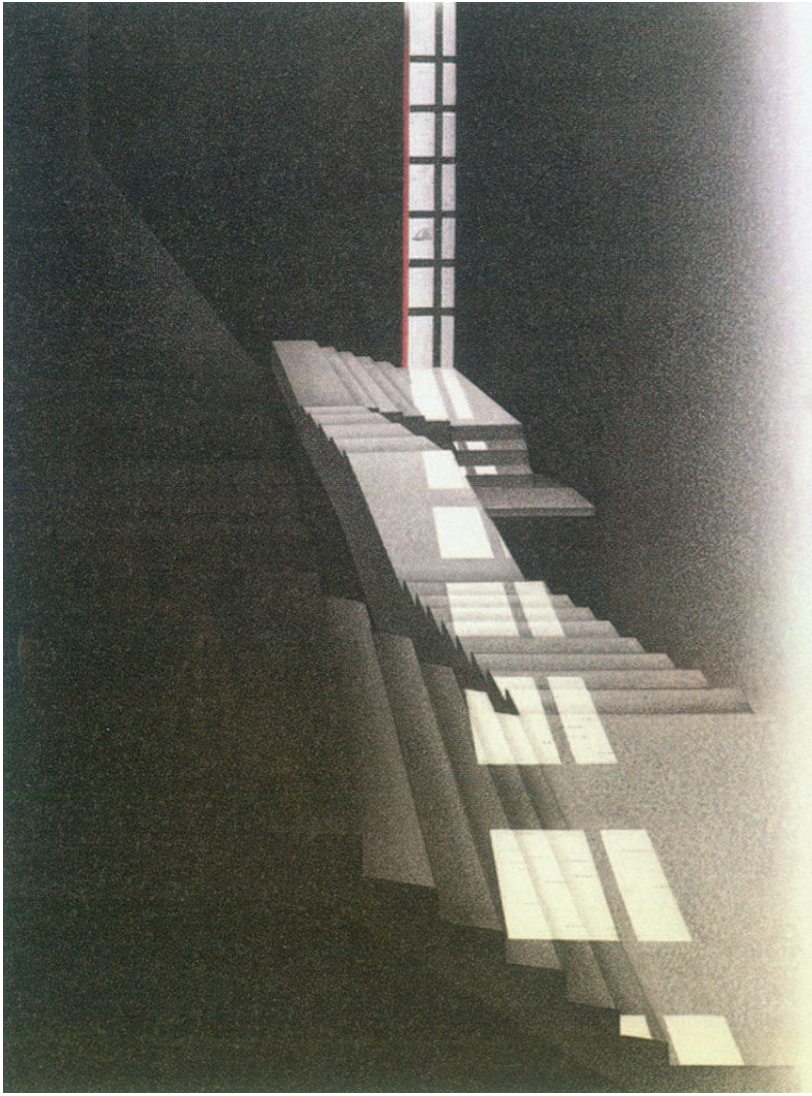
他写冯至，本着从系主任到所长的三十年接触，描写了这个学界泰斗的日常学术与政治运动中的姿态，还有他本人对这位学术领导的揣摩与感受，整体印象是一个“沉”字：“沉默”、“沉郁”、“沉稳”、“高大实沉”，是“端坐于学术宫殿之中的庙堂人物”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识人的角度。对朱光潜的描写令人深思。朱先生是一位以“毅”和“勤”为“突出的精神品质”大学者，“矜持、肃穆、有尊严”，对学术的专注严谨和在学术研究上的坚持，与在被批判时的妥协甚至自我否定的态度，相反相成，构成了不同的人生侧面。可以看出，鸣九对人对时对事，心存同情厚道，他的推导与揣测之语，并不是跟风妄言，也不廉价地搞什么“今是而昨非”。他把共事三十多年的老领导卞之琳定位于“精神贵族”，兼具“党员”、“专家”、“领导”、“雅士”几种特质，从走路、交往、一句评语，加之学术上的严格要求、偶然走神的意态到“无为而治”的领导方式，使我们看到了一位典型的前辈知识分子的做派，也看到了历史的风云变幻中学者们的不同风姿。

鸣九是长期浸濡于“翰林院”的学者，是游走于中法大师之间的学界专家，著作甚丰，但这并没有使他的脾性脱离地气。他对市井人情的眷念和情致，自然感人。他深情地描写父亲辛克劳己，以厨艺挣钱培养儿子女儿“做读书人”；他难以忘怀地记述英年早逝的儿子成长过程中的每一件“傻事”、奇事；他童心未泯地回忆孙女

“小蛮女”的趣事种种；他对并非血亲然而养育留学的“另一个孙女”晶晶也充满着长辈的爱意和自豪。

鸣九终究是在中国文化中成长起来的文人，自称“欧化的土人”，他坚决地、脚踏实地地做着柳鸣九自己，学问再大，文章再好，他不出洋相，相装相相高相和多情相，虽然他早生了华发。他不光生活习惯谈笑举止都是中国范儿，笔法和情感更是中国式的。

他自称要种好自己的菜园子当中计有“亲情篇”、“翰林院内外篇”、“巴黎名士印象篇”、“老门房告示篇”、“演辞篇”、“人文观察篇”、“巴黎之行足迹”、“文友友谊篇”、“自我篇”等，这是他种植的一行行鲜活的蔬菜，鸣九记人记事，把自己也摆进去，看得深但不冷峻，拎得清但不刻薄，对笔下人物的处境有共鸣，对他们的心境有探求，对他们的评价有理解有体谅。在鸣九识人论事的文字风景中，我们也看到了他自己的内心风景——丰富而又善良，体贴而又关怀，好奇而又多思，尤其难得的是他的笃诚与朴实。



风轻轻地吹过 (版画) 邱桂兰



蒸笼

黄芷蒲

好的竹笼只能手制，不能靠机器批量生产。”他得意地轻抚着刚完成的蒸笼，如同在欣赏一件艺术大作。“我们行内叫这个‘大包笼’。学徒满师之后，平均一小时就能做一个蒸笼。那个年代，我们就是这样养活一家子的。”

所谓的“大包笼”，其实是直径二十一英寸的大蒸笼。早期的香港茶楼，会将很多点心统一放在大包笼里蒸煮，然后侍应用粗皮带把点心背在肩上叫卖。后来，茶楼侍应不再托着大包笼叫卖，而是分为大、中、小点，推着小车送点心，于是出现了“叉包笼”、“烧卖笼”等。配合不同需求，德昌的蒸笼分为十七种，直径最小的二点四英寸，最大的五十二英寸。总之，有茶楼开业的地方，蒸笼店从来不愁没有生意。

“得闲饮茶！”（有空到茶楼喝茶吃点心）“饮茶”是香港人的口头禅，这种源于广州的粤式饮食，犹如香港一道最具特色的文化风景。一盅两件，一份报纸，一壶热茶，展开新的一天。广东人所谓的“一盅”是指茶盅，“两件”就是点心。香港人喜欢饮早茶，吃过大包点心，品过一壶茶，一天都精神满满。

要品出粤式饮茶真滋味，还要懂得内里乾坤。虾饺、烧卖、凤爪、排骨四大宝可谓在香港茶楼数十年长盛不衰。单是一笼虾饺，蒸得好吃既要皮薄，又要肉感鲜美，每一个细节都要恰到好处。除了点心，和蒸笼最匹配的食物莫过于笼仔饭了。在蒸笼里铺上荷叶，用米饭垫底蒸熟数分钟，再配衬各种配料蒸熟，数分钟就能完成。笼仔饭既留有竹香，又保有荷叶香。做法虽然简单，但要蒸煮得好，小蒸笼也有大学问。

八十年代初，香港工业发展一日千里。有一段时间，香港出现了很多不锈钢蒸笼和塑料蒸笼，茶楼争相采用。“当时我们很怕竹笼会被取代，后来发现其实不太可能。用不锈钢蒸笼蒸煮点心，水汽会倒流，影响点心的味道。而且点心出锅不到几分钟就凉了。只有竹蒸笼存热，加上竹笼内框与外框间留有一层空隙，加热时蒸汽在内流通，既有助保温，又不影响食物的色香味。完全体现大自然与人类智慧结合的美好。”没多久，茶楼又纷纷改回用竹蒸笼。

然而，随着时代变迁，德昌已经成为香港仅存的手作蒸笼店。我问林师傅：“现在香港还有多少人会做竹蒸笼？”他说：“能够从头到尾独立完成一个竹蒸笼的，香港只有三个人了。”他说的三个人，就是他爸爸、他哥哥和他自己。

“培训一个蒸笼师傅要几年时间，成本太高，利润太低。”年过半百的林师傅坦言，自己已是目前最年轻的蒸笼师傅。看着附近的蒸笼店在没人继承的情况下逐一歇业，他难免唏嘘：“老一辈退休，下一代不愿意接手，这已是一个夕阳行业，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困境。”

我看着店铺里的叠叠蒸笼，仿佛闻到了蒸煮点心的缕缕香味，还有一份不敌现实的无奈。它们承载着无数人的集体回忆，成就了一个家族的传奇故事。但愿老店还在时，能为他们留下一个印记，为他们的故事，写下一段见证。

小时候我喜欢看妈妈蒸馒头。一个个馒头放在蒸笼里慢慢蒸熟，看着水汽从蒸笼缝隙氤氲，令人垂涎。馒头熟了，我迫不及待地伸手去揭。“小心烫！”顾不上妈妈的警示，我迅速揭开蒸笼，雾气弥漫，眼镜顿时模糊了。我小心翼翼地捧着热馒头，闻着芳馥的香味一口咬下去，烫得我哇哇叫，却又忍不住用舌尖去舔它。

晚清时代，广州市郊一带穷乡僻壤，很多村民都靠做蒸笼为生，削竹、开竹、钻洞、编织，蒸笼做好再挑到市集卖给茶楼食馆。一户做蒸笼的林氏家族以手作蒸笼在广州开了一间小店，取名“德昌”。德昌最辉煌时，珠三角各地都到他们那儿取货。后来战火蔓延，林氏家族辗转迁往香港，租了港岛老区一座唐楼的地铺，延续家族生意。

“以前这里有四五间手作蒸笼店，现在只剩下我们这一家了。”

沿着斜坡往山上走，传来一阵清幽气息。年迈的银发老伯伯依偎在木凳上，摇着蒲扇在乘凉。叠得高高的竹蒸笼散发着原始竹片的清香。店里一个中年男子穿着白色汗衫，低着头，一边用竹刀削出蒸笼竹片，嘴里一边说道：“未来的世界能否容得下一个竹蒸笼，没有人说得准。”他叫林应鸿，是老伯伯的儿子，老店的第五代接班人。人家都叫他林师傅。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香港茶楼云集，正值蒸笼店生意最旺盛的时期，大批学徒前来学习制作竹蒸笼。林师傅说：“那个年代，中学读书成绩好的继续升学，成绩不好或家境条件不允许的就直接踏上社会工作。男生学电工、木工、做蒸笼；女生学缝纫、做布娃娃。我们家后厨后屋，孩童时期物资匮乏，娱乐不多，我十二岁就跟着爸爸做蒸笼，短短几年就达到‘小蒸笼师傅’的技术水平。这辈子我没打过工，做蒸笼早已成了我的兴趣变成终身职业。”

林师傅介绍说，做蒸笼的材料主要来自华南的竹树。华南雨水多，竹树长得快，种植三四年，削走罗竹树枝杈就可以用来做蒸笼。一个竹蒸笼，从外框到蒸笼盖，竹制的器皿都发挥着吸水和保温的作用。茶楼蒸出来的点心，既能保温，又能疏导多余的蒸汽，始终保持食物干爽。

我看着林师傅熟练地把竹片打磨光滑，做成蒸笼外边的竹圈。钻洞，穿上铜线。打上竹钉子加以固定，再将削好的竹条逐一用白皮藤条定型，一会儿就完成一个蒸笼。“竹是天然物质，有软硬厚薄之分，而且每根竹子都不一样，蒸笼师傅要根据竹的特性来制作，所以

我自己写一点零零碎碎的记人的文章，和做记者的积习有关。二十多年前，在报社编《流杯亭》副刊，其中有个栏目涉及古今人物，属于打捞记忆的园地。没有稿子时，自己就得填充，于是留意类似的文章。好在有作家朋友的帮忙，甚至得到了黄裳、张中行、汪曾祺等前辈支持，栏目办了近八年，结识的作者多多，自己的趣味，也随之改变了。

从前读苏轼谈论历史人物的短章，觉得彼此不隔，好似炉前对话，趣味良多。但这个路数今人已经不再尝试，类似的文字似乎也难看到。五四之后的文章，学习西洋的随笔者渐多，宋元以来的文脉断了，惟有京派文人还留有些许残迹，可惜已不能造成大势。因为大众的口味和作者的口味均已变化。时风对于文人的影响大呢，还是文人在影响时风，一看也就清楚了。

掌故与逸闻轶事，有历史的本来之色。文化史幽微的部分，有时就在这个空间里。学院派的教科书的文章，是经过筛选的，许多重要的历史片段，不都能进入文本里。所以，读史与读人，还有另一类文字，那些“负喧废话”类的闲言闲语，就补救了某些不足。郑逸梅、张中行等人的文章一度风行，与此未必没有关系。而一些正史里的看法，后来也据野史笔记有所更改，这是后者的价值所在。

但我自己没有考究的功底，历史感也稀薄得很。写这些文字，似乎也难逃附庸风雅的窠臼，只是自己的态度还算认真，所以不想去骗取读者什么。我对于近代以来的文人感受不深，谈论他们未尝不是隔靴搔痒。之所以还在那个世界停留很久，乃是寻找遗失的存在，看看它们对于今人是否还有意义。所得呢，也是喜忧参半，有时候也怀疑自己的选择，也许在不断编织精神的幻影吧。

写历史的陈年往事，今人有不同的方式。启功生前不太赞成作家一味地吐苦水，以为人生多姿多彩，有超越的眼光才对。他看见张中行在回忆里的苦状，就觉在暗影里浸泡过久，于是说，过去的就过去了吧。启先生自己的文章，嬉笑怒骂都有，有时用幽默的笔触调侃一下众生相，遂又跑到庄子式的语境里了。但张中行不是这样，要揪住历史的瞬间，放大记忆的底片，将其打印出来，给世间的过客们看；瞧，我们也有过这样的人生。他写蔡元培，写胡适，写北平胡同里的人物，好似有佛门里的度苦之音，断不了的是慈悲心。对于古今人文脉络的不同处理，也未尝不是作者的信念的折射。

有时看到一些人生前把记忆的痕迹铲掉，觉得很可惜。像杨绛对于手中信件、日记的处理，对于研究者来说都是不小的遗憾。但杨绛的考虑也不无道理，有些远去的思想，纠缠下去实不值得，平淡好于嘈杂，让世间更纯美好。但有些记忆损失了也真的可惜。比如台静农对于鲁迅的资料，是有独家心得的。他晚年在台湾写画画，就是不能触碰鲁迅。因为那是禁忌，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后期，台湾看不到鲁迅的书，而讨论鲁老夫子，有牢狱之灾。台先生最该写的文字没有出来，实在也是一大憾事。这样的遗迹的消失，是永远不能复原的。

我的老母亲八十六岁了，近年来渐渐失去记忆，每天都像个孩子好奇地看着周围的一切。有一次我偶然发现她过去的未完成的回忆录，便读给她听，希望能够唤起她的记忆。当母亲被那些过去的战争的声音叫醒的时候，眼里有点

记忆之影

孙郁

忧郁的神色，好像记起了什么不快的事情。然而很快又平静下来，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。在记忆模糊的时候，她年轻时时代留下的痛感也消失了。

这时候我感到失忆的母亲给自己带来的苦意，当以往的时光与生命感受没有关系的时候，某些意义也在丧失。忽想起一位熟悉的作家在一部小说里对于失忆者的描述，那些不能说、或失去言说能力的人，掩埋了人世间的悲欣。我们或可说这是对于健全的活着的人的一个遗憾，因为那些曾有的存在未尝与我们没有关系。

记忆研究是一门学问，内中的道理显然很深。私人记忆与群体记忆间的关系，梳理清楚也并不容易。有一次见到在东北插队的老友，谈及那时候的知青生活，场景的还原竟然完全不同。后来有人建立了微信群，时常涉及青年时代的往事，我发现，自己认为重要的，别人没有记住，而所能笑谈的，竟是无关紧要的花絮。于是我想，言说出来的，未必是记忆的本真，鲜活的人与事，还静静地躺在时光的深处。差异性的记忆，以及记忆的选择性，构成了精神的不同路向。这路向何以形成的？每一种存在都有价值么？看来在基本问题上，我们还没有全弄清楚。

这一本《苦路人影》也算是历史碎片的一种，都与多年自己关心的话题相连。那些行走在我们前面的人，常常让身后的人看不见他们的表情，能发现的仅仅是路中之影，风中之音。近代史曲折折，那么说它是一条苦路也不无道理。路苦，而影子却印出形体的曲折、短长，让我们窥见了报国的过程。我们因一种思想的承接而寻觅前人，其实想知道自己应如何走路。人的一生相同的地方很多，最不同的一个是走别人的路，一个是在无路之途上。后者的悲壮与创造性大，然而尝试者稀少。看看前人的一些选择，自己总有一种惭愧之感，文化语境分裂过久，我们与前人就天各一方了。那么如此来说，写作也是搭桥，为的是弥合陌生者的鸿沟，我们还是应该跨过它，不要相互隔膜为好。

2018年6月12日

四友记

谢其章

我要说的这四位老友，他们有一个共同之处——心灵手巧。我想说这四位“手巧”，并非欧阳修《卖油翁》所云“无他，但手熟尔”的那种熟能生巧，更像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“天生手巧”。因为我属于“天生手笨”那一类人，所以非常佩服这四位老友。四友分别是“插友”杨兄、陈兄、谢兄与“书友”柯兄。

如果我一直在城市生活尚不至于笨到挣不了一口饭吃，可是偏偏我的第一份职业是用手多于用脑的“下乡插队”，十七岁便到了农村，“天生手笨”的我可遭了大磨难。找出五十年前的日记：“9月10日，晴。早上拿镰刀去割青麻，全组12人都到齐了。干活了，吃饭也香多了。下午跟大白拉（人名）的马车运麻，再把洗好的麻拉回来看，逐家分给乡亲们。晚上开会评分，是‘自报公议’，结果，女生全7分，男生唯我6分。”我为什么被评为最低分，连女生都不如吗？才十岁呀，我就给农民乡亲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我干活并不偷懒啊。至今，这6分还是谜。评分的次日早晨我一个人悄悄到村头大树下偷偷地哭。

看来我扯得有些离题，马上切入正题吧，第一个想说说四友之一，我的同组插友杨兄。杨兄去年六月重病去世，如今写到他，心里隐隐哀伤。杨兄的心灵手巧可以说是全方位的，当学生时他就会装矿石收音机，在村里老乡家的收音机出了毛病，都是找杨兄修理，手到病除，很快他就聚起了人脉，评分总是高分。前几年我回插队之地，老乡还提起杨兄修收音机这一技之长。杨兄二胡拉得好，我最爱听他拉《江河水》，如怨如诉，不但排遣了自己的苦闷，还能经常去公社宣传队参加演出。还有一个往事现在可以说了，知青点的闫兄跟杨兄学二胡，经常将自己的那份口粮匀给杨兄吃。有一回罕见地吃萝卜馅大饺子，一人四个，我眼瞅着闫兄匀了一个给杨兄，我心里咯噔了一下，毕生难忘。

今夜，又是一个七旬星之夜，杨兄，想念你。

四友之二说说陈兄。陈兄插队之前和我是个中学的，小我一年级。插队分在同一个公社但不是一个生产队，相隔十五里地。陈兄在学校时无人不知，因为他是校篮球队的主力，球打得好好到什么程度呢，据说陈兄考少年体校时，教练说这孩子不能

收，他太灵了，他的犯规动作教练都看不出来。我们学校的校办工厂主营象棋子，因此手工课即制象棋子，手艺如我者，刻出的棋子跟狗啃似的，没刻伤自己的手就阿弥陀佛了。而陈兄刀法纯熟，既快又好，直接就刻成了正品。刻象棋盒更是陈兄的殊荣，老师经常让他抱着一堆棋盒回家去刻。那天我问陈兄刻棋子有什么绝招，他说别说是刻一刀转一刀棋子，这样当然慢了，而是是转刀不转棋子，听得我不明觉厉。

在学校我和陈兄没有来往，下乡后才多了走动，双方都感觉对脾气，越走越近。陈兄在农村一如在学校般如鱼得水，我特别犯怵的农活儿，在他却如刻象棋子一样游刃有余。老乡们甚至对陈兄说，你以前不是干过农活呀。割高粱是技术难度最高的农活，公社曾举办过割高粱比赛。割高粱不像割别的庄稼，一陇二陇地割，高粱一割就是十陇，对我而言，手忙脚乱是必然的，横七竖八也是必然的。割高粱场面很壮观，割得快与割得慢的会形成一条条胡同。陈兄说他是属于割得快，并非说什么都难的，倒是“割高粱”难度高。割高粱可不是谁都能干的，割不好就把手伤了，“割刀”还得自己做。陈兄是极少数被委以重任割高粱的知青，这跟手巧不无关系吧。

手巧的学乐器都很快，陈兄的吉他弹得非常好听，我们去他们生产队玩，总要让他给大家弹一曲。陈兄的木工活亦极出色，出色到什么程度呢，这么说吧，可以吃木匠这碗饭。回城之后，陈兄转行为烹饪高手，如今岁数大

了，不上灶了，专门在高档酒店当大厨动不动动嘴。

四友之三说说谢兄，贤婿不避亲，谢兄是我叔伯兄弟，小我三个月。他和我同年下乡插队，同为内蒙哲里木盟，但不是同一个旗，相距很远。谢兄家在天津，小时候来往不多，插队后才亲近起来，我回北京探亲总要在天津谢家逗留几天，最长的一次住了二十几天。插队时互相写信，谢兄的钢笔字好极了，简直可以作字帖。如果只是字写得好，也许不值特为一赞。那个年代，多的是时间，知青精力过剩，总要找点事情做。我亲眼看过谢兄做的衣服，叹为观止！男装女装大人小孩中式西式全行，要是说服装店买的我也能做。最绝的是他的呢子裤，帽子的他也能做。若非亲眼，我是将信将疑的。还有当年时兴的活里活面棉衣，也是谢兄的一绝。就说“锁扣子眼”吧，现在都使专门的锁眼机，当年谢兄都是自己锁。想想真后悔，我为什么当年不求他做一件衣服呢，留到现在多么有意思。

最后一位说说书友柯兄（我习惯叫“老柯”，老柯不老，人高马大而已）。上面的三位是全能型巧手，而老柯的手巧，据我所知只有“修书”一项，虽然只此一项，却惠我良多。老柯与我共同的淘书爱好，与他相识也是在书店。一起逛旧书摊久了，才知道老柯具有修旧书的绝活儿，我才明白他为什么敢买我们看不上破烂书，原来他有本事妙手回春。老柯的技艺高明到什么程度呢，我未亲见他修书的细节，只是拍有修之前和修之后的效果图发给书友们，听到他们一片惊叹，然后纷纷托老柯修书。我开玩笑，你若失业可以凭修书再就业谋食。对于缺失封面的旧书，老柯发明了“平改精”这招，效果奇佳。修书除了手巧之外还需超强的耐心，急性子干不了。我曾经买到一厚卷老报纸，年深岁久，报纸全结板了根本揭不开。请教老柯，他说得上锅蒸，火候得掌握好，才能慢慢揭开。我心想，我有自知之明，你干得了我肯定干不了，至今未敢一试试。